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三期 ——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4f)

【文革一页】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风风雨雨	吴继金
【史实辨证】	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的辨证	阎长贵
【回首文革】	1966年夏北大见闻(下)	李海文
【峥嵘岁月】	寻找父亲在“文革”中的足迹	马思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革一页】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风风雨雨

• 吴继金 •

一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风靡全国、家喻户晓，被推上了“革命绘画样板”地位的美术作品；

一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多，创造中外美术史上神话的美术作品；

一幅使其作者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红极一时，年近花甲又身陷纠纷、历经风波，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美术作品。

这就是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达到了顶峰，以毛泽东肖像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活动也迅速达到了高潮。美籍学者梁庄爱伦在论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时

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肖像和思想主宰了当时的美术。”可以说，中国美术界几乎所有没被打倒或批判的专业美术工作者，都参与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活动。从官方的正式报纸到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以及在红卫兵主办的各种美术展览中，毛泽东肖像创作成为主潮。

为了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频繁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美术展览。这些展览的唯一主题就是歌颂毛泽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品数量令人咋舌。其中，1967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展规模空前，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宣传画、泥塑和工艺美术品，有1600多件。《人民日报》在同年11月28日发表的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颂歌》一文中说：“美展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革命化。美展的所有作品，集中地表现了这一伟大主题。从大型泥塑到小巧的纪念章，从巨幅油画到精细的剪纸，每一件作品，都是为了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本来是为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的名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展览而画的。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2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工人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在《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产生之前，反映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仅有侯一民的巨幅油画《刘少奇和安源矿工》。这幅作品于1961年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1965年与其他的历史画一道被复制赠送外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这幅作品被列为1967年的“五株毒草”之一而遭到了批判，被指责为歪曲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刘少奇涂脂抹粉，并且被认为是“刘少奇在文艺领域试图改变党的历史”的早期证据之一。造反派攻击说：这幅画里没有毛泽东的形象，是企图证明刘少奇是作为代表共产党的工人领袖，而毛泽东只是农民领袖。为了批判刘少奇和歌颂毛泽东，红卫兵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1967年7月，来自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参加了展览的筹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刘春华。

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的举办，也就没有《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美术作品的诞生。这幅油画日后受到如此推崇应当说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的影响相关联的。差不多从预展开始，这幅作品就在展厅中引人注目，受到观众的称赞和好评。直到此画正式发表，其影响日益扩大，从1967年到1969年，这个展览一直开放着，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观众前去观看。当时负责这个展览的张培森日后说：“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我确实有三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我的这一提议，后来居然辗转得到周总理的批准，最后终于办成了‘安展’；第二，没有料到‘安展’又居然产生了一幅在‘文革’中引起那样轰动效应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第三，自然更没有料到后来油画又被画家个人拿到市场上去拍卖，而且卖到那样高的价钱，以致又引发了一场如此大的权益风波。”

二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作者刘春华，原名刘成华，出身于东北松嫩平原上一户普通的农家，从小喜欢画画，1963年进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潢系。1997年获“中国画坛百杰”称号，曾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画院院长。现任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筹备期间，当时还是中央工艺美院学生的刘春华碰巧被抽调去为展览会帮忙。其实，筹备者刚开始到工艺美院物色美术方面的人才时，

找到了“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提出需要人手，为展览进行设计与绘画创作。原本学校向筹备单位推荐的是另一位学生，由于等了一段时间迟迟没有消息，这名学生便离校回老家了。此时，学校又接到通知让创作成员马上赴安源体验生活，因没有地址，无法与那个学生联系，刘春华便作为临时顶替者来到了展览会的驻地——中国革命博物馆。谁都没有料到，这次偶然的顶替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空前的轰动，同时也改变了一名普通学生的人生道路。

刘春华在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记得是7月初，因为我去得晚，就剩下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的选题了。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就有个画毛泽东肖像画的冲动，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他在1968年7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介绍《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过程的文章中说：我是学工艺美术的，过去没有学过油画，困难是很大的，真是又激动，又胆怯。但是当我一想到毛主席，想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渴望看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心情时，我的胆子就壮了。有了忠于毛主席的感情，就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歌颂伟大领袖是亿万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是个贫农的儿子，解放后，能够上大学，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养大的，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爱群众之所爱，画群众之所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战斗任务，我们到毛主席亲自点燃革命烈火的安源路矿去参观、访问，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在去安源以前，我们就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许多安源工人运动的史料。到安源以后，通过访问老工人，使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到安源工人斗争的史实。从1921年到1930年，毛主席跋山涉水，曾经多次来到安源，领导英雄的安源工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主席亲手在安源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向工人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建立起党团组织。是毛主席亲自做出了安源大罢工的英明决策，号召工人进行坚决斗争。是毛主席在安源亲自部署了震惊世界的秋收暴动，创建第一支工农武装，奔向井冈山，开拓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毛主席在安源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一部无比宏伟壮丽的史诗。我们能用画笔来表现这部史诗的一个片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在创作过程中，刘春华走访了当年的革命遗址，广泛地搜集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和诗词，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的有关历史资料，先临摹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照片，不断琢磨研究，最终形成了画面中的毛泽东的形象。画面上的青年毛泽东身穿一件传统的中式长袍，一只手拿着一把油纸伞，另一只手握着拳，意志坚定地大步走在山路上。在构图安排上，毛泽东居于画面当中，背景的上方朝霞滚滚，下方则乱云飞渡。这幅画图片下方印着：“一九二一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

刘春华根据主题的需要和群众欣赏的习惯，利用油画表现力丰富的特点和中国传统绘画细致的优点，大胆尝试，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因为当时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后来有人提出，单幅油画作品很少有“集体创作”的，总不能你画人像，我画天空。此外。该画在当时就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毛泽东出现时，要阳光普照大地。还有人指责画面上就毛泽东一人，孤零零的，这不是影射毛主席脱离群众吗？但是刘春华坚持己见，宁愿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挂上了个人“执笔”署名。

1967年10月1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当时的油画说明词称：“毛主席1920年去安源。”10月18日，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少将观看展览后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有误，他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

事后，王耀南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他直接向毛泽东询问第一次到安源的时间。一天饭后，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在一起闲聊。汪东兴的秘书高长臣见主席谈话兴趣正浓，立即凑上前问：“主席，您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吗？”毛泽东沉思片刻，操着浓厚的湘潭口音，不紧不慢地说：“二〇年我有没有到过安源，记不清了，二一年秋这一次是对的。”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于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立即改为：“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当时，一般毛泽东的画像都是以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做背景的，而这幅画则不同，刘春华日后对此评论道：“我选择这样的背景也是经过反复斟酌才决定的。在和工人聊天过程中，工人告诉我，当时南方的天气阴晦多雨，毛泽东是傍晚到的安源，天色不可能是艳阳高照。所以，我选择毛主席带雨伞。工人们还给我背了一首民谣：‘直到1921年，忽然雾散见晴天，来了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也说明在毛主席没来之前，那里旧势力的猖獗。我选择云彩是为了渲染当时毛主席的到来，要掀起革命风暴的气氛。他们还说，工人们的心中毛主席是先生，所以我选择了他穿长衫。”

关于《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创作，刘春华在当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构图和色调是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将毛主席安排在正朝观众的位置，他远远地，而且镇定自若地朝我们走来，像太阳带给人民希望，我们努力使他身上的每一根线条具有内在含义，高昂的头微微侧转，以表达他的革命精神，不怕艰险和强暴，勇敢斗争并赢得胜利。紧握的拳头表达他的革命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决心克服任何困难去解放中国和人类，自信一定会胜利。手中的旧雨伞显示他刻苦工作，生活简朴的作风，为革命长途跋涉，风雨兼程，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过崎岖坎坷的小路。毛主席为我们留下足迹，铲除路上的一切障碍，领导我们前进并走向胜利。秋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吹动他的长袍，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背景上疾行的云，揭示毛泽东在斗争最尖锐的阶段抵达安源，和他的平静坚定的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

《毛主席去安源》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1968年6月，江青赞扬送审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都画出来了”。6月30日，江青还做了这样的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属（署）上作者名字。”

在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有这样的报道：“在江青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这幅油画成功地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和革命实践，是一幅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艺术珍品。”

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在谈到“四人帮”及御用文人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样板画”的评论时说：“他们说该画是‘在江青……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产生，是江青的‘又一杰出贡献’，并号召人们要‘紧跟江青’。……此画为这位‘首长’钦定的事实，是他们在文艺评论中尊崇‘权力即真理’论的佐证，也是江青为当女皇将毛主席的画像做敲门砖的丑恶表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江青树立这幅“样板画”的实质及其险恶用心。

江青在美术界树立“样板画”，似乎体现了她对绘画艺术的重视，甚至不少人认为这促进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事业的发展。但事实恰恰相反，撇开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美术

家的迫害及对美术事业的摧残不论，这种公式化、强制性的“样板”艺术模式只能遭到人民的反感，最终窒息、妨碍美术事业的正常发展。

由于江青的青睐和各种政治因素的作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艺术技巧并不突出的美术作品，一下子身价百倍，被推上了“革命绘画样板”的地位。它的公开发表，以及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是被作为一道政治命令来下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还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迎接。

1967年底，《北京工人报》报道“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时，将刘春华的作品作为题图率先发表。1968年的“七一”，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和钢琴伴唱《红灯记》被江青指定为向党的献礼作品，也借此繁荣文艺创作。1968年7月1日，当时中国最高的政治信息传媒《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不同寻常地刊发了这幅作品的彩色照片，并发表了阐释画面政治意义的文章。这样，这幅油画一夜之间就成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又一优秀范例”，与“八个样板戏”一起成为艺术领域最高成就的象征。

1968年7月1日，《毛主席去安源》被印刷成彩色单页，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简称“两报一刊”，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赠送，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纷纷随报赠送，又印制成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发行。截至1969年底，全国出版部门共印制了1.91亿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印刷了9亿多张，成为世界油画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创造了中国油画的神话。

当时，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的宣传规模，在文艺评论史上，在新闻报道史上都是罕见的。以上海《文汇报》为例，1968年7月2日至20日，短短19天中就动用了12期报纸，其中包括9个专版，或发社论或发编辑部文章，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消息，或占用一版头条，或占用整个一版，或大字围框，在历史上还从没有一张画受到过报纸这样的“恩宠”。

由于江青的青睐，其“御用评论”也跟着进行别有用心的大肆吹捧。1968年7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又一朵大香花》，盛赞这幅油画：“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一幅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创作出来了。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花苑里又一朵大香花的开放！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在艺术领域里，成功地刻画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刻地反映我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文艺史上还是第一次。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洋为中用’的又一样板，是美术史上的新篇章。”

7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创作——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文中说：“他们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不是一幅普通的油画，而是一把刺向中国赫鲁晓夫心脏的利剑，是一首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赞歌。这是产生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的伟大作品，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伟大作品。”

12月2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范例——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说：“看呀！毛主席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历史的重任，染一身风尘，披万道霞光，迈着雄健的步伐来到了安源。从此，安源路矿工人找到了救星，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领袖，千万劳苦大众有了解放希望！”

《毛主席去安源》公开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唯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同年10月1日，北京的

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全国各地曾一度掀起了“庆画”、“迎画”、“颂画”的热潮。这幅画所到之处都群情欢腾，大家敲锣打鼓地加以迎接，有的甚至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响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7月8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手捧着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兴建建筑面积为3200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用瓷砖镶嵌而成。该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在安徽省合肥市，特地用民航飞机将北京油画制作的印刷原版运去，还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迎画仪式。总之，在一个时期，全国范围内，家家户户都挂有这幅画像，有的家还不止拥有一幅。

不仅如此，《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还被印上了文化用品、邮票、中小学的课本等等，上海一家文化用品公司光是笔记本就印了5000万册。还被制作成了各种类型的像章发行，这一类像章“多数是全身像，是按油画缩小比例浮雕精制而成的全景图像章，也有少数为了突出油画的细部，采用头像或半身像的形式设计制作”，“堪称毛泽东像章中的代表之作”。1968年8月1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1枚邮票。为了不玷污这枚票上的毛泽东形象，保持画面完美，邮电部于7月底就发出了紧急通知：“决定破例在贴用邮件时，不予盖销。另在邮件封面上空白处加盖收寄日戳。如有误盖，立即换贴，望严格执行。”这也可谓中外邮政史上的奇闻。

有位学者在谈到《毛主席去安源》这幅作品时说：“无论从它产生的背景和它后来的广大影响，都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的历史的纪录。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画的一幅领袖画像，为什么会受到那样超常的赞赏和鼓励，进而受到人们那样如痴如醉的膜拜，离开那个特定的复杂政治因素，离开中国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群众中的无比威望，离开那个时期人们普遍的对领袖毛泽东的神化心态，是很难理解这一事件的。我想也许这就是《毛主席去安源》画特殊历史价值之所在。”

四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1972年9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做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展厅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该文在赞扬油画《追念战友》的同时，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指出：“在这幅画（指《追念战友》——引者注）前，不禁又想起林彪、‘四人帮’鼓吹过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

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发。”这是出现的唯一一次公开批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字。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了恢复刘少奇、李立三等在安源工人运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这次修改中，考虑到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本人对画中身穿长衫的形象又提出过质疑，再加上该画曾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所以该馆将展厅陈列的最后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取下。

1986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正门最高处，由428块瓷砖镶成、直径6米的《毛主席去安源》因年久失修，部分瓷砖颜色脱落，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换成了由铁锤、岩尖和火车轮子图案组成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徽章。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销声匿迹。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扑朔迷离的传闻，什么“这幅画是‘四人帮’搞的”，“毛主席没有到过安源”，“油画作者有问题”等等。

《毛主席去安源》这幅作品的巨大成功，可以说其政治因素远远大于其艺术因素，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著名学者易英对此评论说：“无论从‘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领袖题材的油画来看，《毛主席去安源》在技法与构思上都不是一幅成功之作，但在那个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时代，作为仅有的一幅主题性绘画的创作又显得非常突出。……当然，这幅画是在短短3个月内创作出来的，作者又是一个没有油画经验的学生，其水平也就仅限于为一个地方展览馆绘制这类近似宣传画的作品，这也算最好的结果了。”然而，从客观上说，这幅作品毕竟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991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迎接安源大罢工胜利70周年，在北京召开基本陈列内容修改方案座谈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史学专家在会上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以陈列。该画是专为安源而作的，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大肆宣传过就不敢陈列。根据专家意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于199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70周年前夕，在基本陈列中恢复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由作者亲手临摹的）。

物以稀为贵。《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之后，反而愈显珍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拿出库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销售，观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当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更是身价百倍。

1969年，《毛主席去安源》一画被移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80年，刘春华以该画系个人创作为由，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取走此画。1995年10月，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出的“95秋季拍卖会”上，《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经过数番竞价，最后由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以605万元的价格，竞得这幅历史意义独特的作品。这创造了当时中国油画拍价的最高记录，并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了近10年。

1998年1月25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鉴定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可定国家馆藏一级文物。”

之后不久，这次公开拍卖引出了一场官司风波。1998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以财产返还为由将刘春华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非法处置占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1999年10月19日，当时参与创作的郝国欣、李绍洲二人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画为合作作品，著作权为集体所有，并认定刘春华侵权。2001年3月15日，

刘春华以确认作品署名权为由反过来将李绍洲反诉至法庭。

2001年4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围绕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引发的3起关于作品原件归属权、作品著作权纠纷官司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绘制事实，刘春华应是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革命博物馆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以创意、构思不享有著作权为由，判刘春华在郝国欣、李绍洲诉其侵犯著作权一案胜诉，同时驳回了刘春华反诉李绍洲作品署名权的诉讼请求。中国革命博物馆以“驳回起诉严重损害了国家对一级文物的所有权”为名，再次提出上诉，也被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并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总之，《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传播到其官司风波，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风风雨雨，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变化。

□ 《党史纵览》 2008年第2期

~~~~~

### 【史实辨证】

#### 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的辨正

• 阎长贵 •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这两句诗，多年来被许多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陈明远的，陈明远也说是自己的。有一本名为《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通书内容都是讲陈明远因“诗词”问题在“文革”中被整的情况，其中也讲到这个问题。打开电脑搜索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条目，有很多。一句话，这件事情仿佛已经尘埃落定，即这两句诗的作者是陈明远。对此“不刊之论”，我有疑问。我提供几份材料，供方家和广大读者考虑。

#### ◇ 我所知道和经历的这两句诗的来历的情况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传很广的两句诗，在许多红卫兵报刊的文章中，不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是在文章的结尾，常常引用这两句诗以壮行色；有的甚至直接用作文章的题目。有一幅毛泽东写大字报的“文革”宣传画，其文字说明就是“千钧霹雳开新宇——炮打司令部”。不仅在红卫兵的报刊中，就是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文章中，这两句诗也常常出现。这两句诗影响这么大，究竟是谁的？许多人认为是毛泽东的。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文章，其中有云：

红旗飞舞冲天笑，  
赤遍环球是我家。  
千钧霹雳开新宇，  
万里东风扫残云。  
志存胸内跃红日，  
乐在天涯战恶风。

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上引这些词句都不陌生。我当年参加的战斗队名称就叫“扫残云”。



这些诗句何等豪情，何等气势！作为“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曾经鼓舞了几亿人的斗志。

不难看出，直到今天的这篇文章，使人感到还有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这两句诗（其他的姑且不说）看作是毛泽东的；其影响之大，连作者在“文革”中参加的战斗队的名称都叫“扫残云”——这充分表明了它作为“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威力！当然，这篇文章也说到这两句诗的实际作者是陈明远。这两句诗的真正作者是陈明远，这在学界，特别在研究“文革”史的人当中，仿佛已成定论了。现再抄两则有关材料：

有个名叫李彩云的作者，在《科学家兼诗人陈明远的一家》中说：“陈明远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也许会更记忆犹新。‘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文革’初期，这曾被误传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陈明远却是它的真正的作者。”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含糊。

一位名叫王佐良的作者，在《一代奇才——陈明远诗选》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关锋发表文章是1966年4月5日，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中央文革小组还未成立，因而关锋也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的大文章，结尾的地方来了两句诗：‘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作了这样的说明之后，不知道作者根据什么断言：“读过关锋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位作者（指关锋，其实作者还有林杰）是不会自己写出这么两句诗来的。”按照作者的说法和口气，关锋“是不会自己写出这么两句诗来的”，那他只能是“引用”和“抄袭”别人的了，即“引用”和“抄袭”陈明远的。我认为，作者这个论断非常武断。“文革”前，关锋是有一定名气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很强调“训诂”，有相当的古文功底，怎么就写不出“这么两句诗”来呢？再说林杰，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调干生，也有很强的古文功底。

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即这两句诗的作者究竟是谁？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作一番辨正的问题。

首先说，这两句诗是不是毛泽东的？人们已肯定回答：不是，绝对不是，翻遍迄今各种正规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或《毛泽东诗词》版本都不能找到这两句诗。有一次在聊天中，一位同志根据毛泽东孙子的名字叫“毛新宇”，断言这两句诗是毛泽东的。我说，“毛新宇”名字的由来，是否和这两句诗有关，我不知道，但由此断言这两句诗是毛泽东的，绝对不符合事实。那么，这两句诗是不是陈明远的呢？据查198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中有首《跨东海》的七律，其中确有这两句诗——只是这里是“扫剩云”，而不是“扫残云”，诗作时间是1965年春。该书注释说：原为“扫残云”，后改为“扫剩云”。为什么作这种改动？没有说。关键是有个问题现在还不清楚，陈明远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公诸社会或流传到社会上的？如果是通过所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流传到社会上，那就肯定是在“文革”开始后（很多讲这个问题的人也是这样说的），而不是在“文革”开始前。

下面，我讲一讲我所知道的这两句诗的另一种来历。

1966年初，即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而“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开始时（请读者注意我说的这个时间——特定的时间），林杰起草、关锋修改，两人合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的文章，于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上发表（发表时署名关锋、林杰，因为关锋是老师，林杰是学生）。这篇文章的最后即结尾就是这两句诗。据我所知，这两句诗出自林杰之手，至于林杰是直抒胸臆，还是从别人的诗句中脱胎而来，我不

大清楚。发表前，这两句诗的词句不是这样，而是“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征求我的意见时（当时我和林杰都在关锋任组长的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工作），我说：“千里”、“万里”重复似不好，“对仗”也不工，可否将“千里”改为“千钧”。关锋很赞赏，说改得好，还讲了历史上“一字师”的故事。我所知道和经历的情况，就是这样。

#### ◇ 林杰给我的信

《我所知道和经历的这两句诗的来历的情况》（原题为《关于“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来历》）写成后，我将它送林杰核阅和指正。他给我回了一信，讲了他写出这两句诗的缘故和过程。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老阎：

大作《关于“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来历》已拜读，你说，“这两句诗出自林杰之手”，并说“这是我所知道和经历的情况”，这句话说得实在，多谢

诗中的“钧”字原作“里”，是你建议改的。所以这两句诗出于我之手，这是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千真万确，是没有怀疑的。

这两句诗的写作时间是1966年3月。那天我、关锋和你在关锋家讨论文章修改问题议论到高亨先生的词《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很赞赏。词的开头写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高亨词原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笔者）我们在赞叹之时，关锋说，林杰你考虑一下，文章结尾也来点雷声吧！我说，好。于是我就思考“雷声”。开始，想加一首比较豪迈的诗，但一时想不出来。当时我想到几年来，毛主席发表了不少反修防修鼓舞人心催人振奋的诗词，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等。感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心怀革命豪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敬意，忽然想起了一句民歌“千里雷声万里闪”。于是，我就写出了“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写好以后，思想很兴奋，就匆匆念给关锋和你听，没有想到这是诗还是文，也没有考虑文字和平仄问题。你说，两个“里”字重复。建议前一个“里”字改为“钧”字，大家都同意。这就是这两句诗写作的实际情况。

1966年8月，听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传达，很兴奋，再看旧作，我又加了两句，改成一首绝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六亿工农齐奋起，豪情壮志满乾坤。觉得诗意不多，一直没有给别人看。

至于有人说，那两句诗的作者是陈明远，是我抄袭他的，这是无稽之谈。我的这两句诗，发表在1966年4月5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两句诗的产生你亲见亲闻，可以作证。发表后，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1966年6月6日，北京四中薄熙永等6人，在一张大字报中，加以传抄，他们把“雷声”两个字改为“霹雳”改得好。谢谢这几位不认识的年轻朋友。说我抄袭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陈明远的诗句，奇谈怪论，莫此为甚。

有人说，陈明远的“两句诗”，被当作没有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在“文革”中流传。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文革”中流传没有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它必定在“文革”正式开始以后，不能在这以前，也就是说必在《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通过以后。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可以开展“四大”。在

“破四旧”过程中，红卫兵发现了毛主席没发表过的诗词，有些人就把它编辑、刻印出来，起名《毛主席诗词》，赠送给亲友，在社会上流传，时间主要在1966年底。这些毛主席诗词并不都是毛主席写的，有的是年轻人自己写的，也鱼目混珠，夹杂其中。我写的那两句诗是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1966年3月，当时根本不存在没有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当然，更不可能有陈明远的诗词被当作毛主席诗词在流传。

“文革”中，那两句诗在群众中传抄，那只是流不是本源。本源就是1966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我和关锋的文章。其作者是铁板钉钉，任何人否定不了。……

最后，我对大作提点意见。你说，“据我所知，这两句诗出自林杰之手”，“我所知道和经历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话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你又说“林杰是直抒胸臆，还是从别人的诗句中脱胎而来，我不大清楚”。我感到这后半句话，有点画蛇添足，多余了。背离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我没有离开关锋的那间小屋，也没有翻看别人的诗句，一切活动都在你和关锋的视野之中。应该相信你自已见闻所知，不应该犹豫怀疑。关锋叫我来点“雷声”，我临场构思，一气呵成，这你很清楚。……

不妥之处，请指教。

敬祝

撰安！

林 杰

2007年7月10日

林杰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情况，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他作为当事人，他的记忆比我的记忆要强得多、详细得多，但大致的脉络和情况是相同的。

#### ◇ 北京四中的一张大字报

我们看到，林杰在给我的信中说，1966年6月6日，北京四中薄熙永等6人在一张大字报中把他这两句诗加以传抄，并称赞他们把“雷声”改为“霹雳”。这确实是这两句诗的第一次公开流传。当时也只能用大字报的形式，因为还没有出现什么红卫兵小报之类的东西。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张大字报呢？这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其中内容就是赞扬和支持清华附中的“革命”行动。他们写道：

清华附中的革命同志们，我们热烈欢呼你们伟大的革命行动：

清华附中的同志们，你们做得对，干得好！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是骂出来的，胜利是斗争得出来的。坚持真理，勇敢战斗，群众就会支持你们，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清华附中坚决的革命派已经站出来了，广大教师学生是起来革命的时候了，是考验每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是捣毁“三家村”的时候了！

如此等等。大字报的结尾写道：

看如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革命群众坚决起来扫除一切害人虫！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这两句诗，就是从这张大字报开始流传——广泛流传起来的。可以断言，这张大字报所引这两句诗的出处，显然是登载关锋、林杰文章的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或同日转载关锋、林杰文章的《人民日报》，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当时还没有出现的所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至于说，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1966年3月写出这两句诗的关锋、林杰是抄袭当时还没有出现的混杂在所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的陈明远的诗句，那就有点太离谱、太难令人信服了。

以上就是我为讨论这两句诗的作者问题提供的几份材料。请大家看看：这几份材料是否有助于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2期

~~~~~

【回首文革】

1966年夏北大见闻（下）

• 李海文 •

◇ “七二六”万人大会

1966年7月26日晚，继续开会。

会议还没有开始，北大附中的造反组织“红旗”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并受到掌声欢迎。从此，“红旗”、红卫兵名声大噪。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支持他们所写的造反有理的信和彭小蒙的发言，各校纷纷效仿成立红卫兵。虽然红卫兵成立于5月底6月初，但是第一次引起社会、中央关注是从这两天的会议开始的。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转为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此，工作组撤走，群众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这天的会议，所谓的辩论完全是讨伐工作组的罪状，大会成为反工作组一派宣告胜利的节日。只有中文系的两个女同学李扬扬和雷俞平发言，为工作组辩护，说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毛泽东有一篇文章以延安代表共产党，西安代表国民党。她们借用于此，表示工作组是共产党，有错误应该批评帮助；工作组不是国民党，不能赶走、打倒。她们的勇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知道，这两位女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明明知道中央的态度变了，仍坚持念写好的稿子。据说原来有31个人签名，最后只剩她俩了。

东操场的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发言者都站在最高一层的主席台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被审判的位置。正在发言的北大附中的“红旗”的头头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张承先是河北省委书记。我坐在台下看得很清楚，心里一紧。打人之事就发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眼皮底下，没有受到批评，“红旗”由此成为“左”派，飞扬跋扈。中央文革小组公开鼓励打人，工作组撤走后，打人成风，这是肇始。

陈伯达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建议”：第一撤销张承先的工作组；第二在学校成立由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当时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认真地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同学们递的条子后才支持群众，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已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了。24日下午陈伯达到广播学院宣布了这个消息。因广播学院在东郊，远离西郊的各大专院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文革”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先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表态，才有群众的大动作。中央文革马上支持这些群众的行动。“文革”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最后康生作总结，点名批评李扬扬，然后宣布工作组两大罪状。第一，50天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多天来，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它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这个帽子可够大的，问题顿时严重了。《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在党员中传达时，对大家的震动之大，特别是最后这句话，令人难忘。肖超然老师传达时，念完就宣布散会，没有一句说明、解释。散场时，人人感到肃杀之气，个个神情凝重，互不讲话，会场除了噼里啪啦的椅子声外，没有其他声响，格外肃静。现在大家马上明白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不是刚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更大的。更大的是谁呢？但是，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刘少奇。那时，谁也不敢这么想。

容不得我多想，看见江青走到李雪峰跟前，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大家屏息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李雪峰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此时，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评，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报上公布了毛泽东7月18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大家知道毛泽东不在北京。毛泽东到底知道不知道北京派了工作组？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没有？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成为多年不解的谜团。

李雪峰所说的“奉陪到底”被江青记在心里，到1970年华北会议时拿出来，成为李雪峰的一条罪证。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介绍到会的人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各大区书记都没有讲话，只是陪衬。为什么让他们来参加？是表示中央团结一致，还是壮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还是让他们来学习？我坐在台下，只能胡猜，只能观望。

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江青讲话说历史系迫害她的女儿，点了历史系两位教师的名字，还说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来了，多有不当之处。引起同学们议论，有人说：江青刚登台，就报私仇。哪像个政治家，哪有政治家的风度。

◇ 北大率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7月28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开会后的第二天，聂元梓出面倡议，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可借鉴。第二，巴黎公社只有人民才有选举权，北大师生近两万人，敌我的界限是什么？谁有资格鉴别、决定呢？在一片打倒声中，又没有作组织处理，这个界限可不好把握，谁也不敢出来说他有资格。因为那样不但会引起争论，甚至会引火烧身。第三，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权力真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想将北大树为全国的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国运动，必须在一天之内产生新的权力机关——校文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当时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各系出一个人组成校委员会。根本来不及召开全系大会选举，不知道是什么人议定的。聂元梓是当然的校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11日，由筹备委员会成立校文革委员会。国政系推举的委员是我班同学廖淑明，他还当上了常委。时间不长，10月13日，廖淑明贴了一张大字报《整常委的风》，矛头直指聂元梓。这样一来，他这个常委自然当不下去了，他自行外出串联。学校里乱哄哄的，大部分学生冲入社会，外出串联，没有多少人关心校文革委员会的变动。

◇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大乱

1966年7月29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后的第三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大每个班都派一个代表参加，我们班班长马德举参加，他回来向同学们传达了会议情况。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从后台走上主席台，和群众见面。与会群众见到毛泽东万分激动，掌声雷动，持续10分钟，一直到毛泽东离开才停止。班长马德举说：“掌声不停，毛主席没法讲话。”为失去当面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机会感到十分遗憾。

会后，工作组撤走，学校由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委员会掌权。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通天人物，最先知道中央文革最新指示，积极贯彻。

工作组走后，同学中主张讲政策的声音顿时被淹没了。因为中央文革在群众大会上鼓励乱斗，主张打人。当时流传一句话：“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锻炼；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活该。”很快出现了“红色”恐怖，美其名曰“红八月”，真是匪夷所思！

工作组撤走后，老师们被剃成阴阳头，顶着烈日在校园内劳动。北大校园里人山人海，每天从全国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围着正在劳动的老师指指点点，个别的还扔土块。我住的36号楼后面有一个花坛，每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有人将校领导陆平、彭佩云揪到花坛示众，让他们举着牌子在花坛上走一圈。其实就是满足那些外地学生的好奇心。每到这时，口号声不断。

10月1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全国形成串联高潮。学生串联，管吃、管住，坐车不要钱。同学们都外出串联，名为串联，实为参观、游览，只有极少数人是到各地

煽动、指挥造反。有的学校因学生都外出串联，没有人看“黑帮”，“黑帮大院”自行瓦解，校领导、教师们“自己解放自己”，都回家了。“黑帮大院”就是关所谓有问题的教职员工（那时将他们也称为“牛鬼蛇神”）的地方，简称为“牛棚”。

◇ 中文系的辩论，《人民日报》的编辑回答：上级规定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

北大的工作组是中央文革小组赶走的，校内无论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都没有形成很大的力量。工作组走后，集体学习渐渐地搞不起来了，但是校内并没有出现两派对立的局面。出现反聂元梓的势力是10月以后的事。但是中文系与众不同，全系师生天天在学三食堂辩论，晚上灯火通明，我从窗前路过，听到里面唇枪舌剑，异常激烈。

后来知道辩论起因于《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发表了一位四年级学生的文章，题目是《控诉陆平黑帮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注明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文中说：“我一进北大，就被黑帮分子推进了故纸堆。他们把上百部古书列为我们的必读书目，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却被排斥在一切课程之外，至多也不过是可看可不看的‘参考资料’而已！在这里，黑帮分子什么五花八门的肮脏东西都宣传，唯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1964年三四月间，我们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北大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在北大培养不出跟贫下中农一个心眼的人来。回到学校，我再也呆不下去了。5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学校‘党委’，强烈要求到农村去扎根。然而，以陆平为首的黑帮分子不仅不支持我，却反诬我‘没有很好地听党的话’，是‘小生产者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表现’。”“前年12月，我在北京郊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又一次提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申请。陆平黑帮仍然借口‘高教部和北京市委没有此项规定’，不予理会。他们还又打又拉，说什么‘党需要你留在学校里继续深造，以便将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说什么‘党培养一个大学生不是为了让他当农民’。他们说得多‘甜蜜’呀，他们对我是多‘关心’、多‘器重’呀！但是，他们这一套骗不了人，这分明是一个大阴谋。他们反对同学们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一心要按照他们的标本，把我们培养成死心塌地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效犬马之劳。在我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期满后，他们制造种种借口，不听我的申辩，拒不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就这样，我成了陆平及其追随者的眼中钉。”

文章只提到“陆平黑帮”，但是系里的师生都知道这是指中文系总支委员吕乃岩老师。工作组在时不让为此事辩论，现在工作组走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支持运用大辩论这种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一派人支持，指责吕老师的“迫害”；另一派人说吕老师就是爱护学生，没有迫害。大家都知道1964年周恩来给大学毕业生作报告时说过：全国一百个同龄人，只有一个人上大学，一个人参军。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随着争论加剧，各派在校园内贴大字报，阐明各自的观点。支持吕老师的同学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发表此文的编辑，问：你们为什么发表？你们调查了吗？编辑回答：上级规定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

我因无事，经常看大字报。当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时大吃一惊。蓦然想起，“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曾登过几个小孩坐在田里的庄稼上，以证明粮食高产。事后知道这张照片是将若干亩的粮食堆在一起，记者导演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我曾听父母在饭桌上议论，这次会上，大家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意见很大，他们不实的报道对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内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纠正了浮夸风在内的五风。怎么现在竟然又会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这不是又重复1958年的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已受到批评、纠正，为什么现在又要重复？这种造假的新闻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时我的这种忧虑仅是朦胧的感觉，还不可能像今天讲得这样清楚。

中文系最早分为两派，其恶果是，1966年、1968年有两个学生死亡。他们都是二

十几岁的青年，还未走上社会，就在严冬中凋零。

◇ 从批判工作组到“打倒一切”

那个年代，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反复向红卫兵讲历史教训，宣讲政策。而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不制止这种胡作非为。林彪有一句名言：“这次运动就是革那些革过别人命的命。”这不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就是要改朝换代吗？那时我们都蒙在鼓里，还企盼着林彪、中央文革出来说话制止，常常想：为什么林彪、中央文革不制止？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煽动的，他们怎么会制止呢？！

批判工作组的调子越来越高，一开始冠以刘邓路线，后来上纲为反动路线。被打倒的干部越来越多，从农村生产队长、社长、区长、县长、专员、省长、大区书记，一直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副总理及国家主席，凡是带“长”的几乎无一例外。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全国各地干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形成“打倒一切”的局面。谁想斗就斗，谁想打就打，打伤了，被杀了，都找不到凶手。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身安全，在中国竟找不到一块安静、安全的地方。监狱反而最安全。以前特赦的战犯受不了群众揪斗，提出要求回到监狱。他们（沈醉等）回到监狱躲过了群众斗争的高潮，少受了许多皮肉之苦。

许多人都不明白：50天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就这么大，非要把干部都打倒，才能解决？才能纠正？17年的成绩还承认不承认？

随之而来，国家局面越来越混乱，武斗不止，形成全面内战。

我百思不得其解，常常想：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干部都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想抓、想杀而没有得手，今天却全部被打倒，游街、关押。什么是反动路线？

毛泽东将“文革”这种混乱局面概括为八个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认为这是“文革”的主要错误。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后，开始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革委会班子，毛泽东宣布必须结合老干部才能成立革委会，否则中央不予承认。从那时起就不断解放、结合老干部，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到1975年的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由于“四人帮”阻挠，解放的是少数，出来工作的更是少数。对多数干部没有作结论，或者结论留有尾巴。多数干部没有出来工作，工作也不是官复原职。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

1968年，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两年努力，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渐渐安定下来。幸亏有毛泽东、周恩来，终于结束了全面内战，没有形成割据，党和国家没有分裂。幸亏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江青，否则局势进一步恶化，还不知道会是谁上台，还不知道内战打到哪天，打成什么样子。如果内战不止，干部全被打倒、被打残、被整死，结束“文革”从何谈起？改革开放从何谈起？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2期

~~~~~  
【峥嵘岁月】

寻找父亲在“文革”中的足迹

• 马思猛 •



父亲（马彦祥）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我从未听父亲讲述过，他只是在他感觉最困难和没有出路的时候，向大姐表示过，准备到开封大姐家度过晚年，他曾惴惴不安地问过大姐，你能收留我吗？对一生好强从不服输的父亲来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向子女流露自卑的情绪。我在收集文艺界在“文革”中惨遭打击迫害的资料时，发现父亲留下一片空白。父亲在他的《年表》中对“文革”十年的表述，只留下一段话：

1966年6月，江青、张春桥策划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我和文化部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强制参加集训班，进行所谓揭发、交待。9月，又回到文化部机关接受“批斗”，并被关在原文化部大楼旁的一座破庙里“隔离审查”。

1969年（62岁）9月文化部所属单位广大干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年底马彦祥和周巍峙、司徒慧敏、唐瑜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也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审查”。

1975年（68岁）12月，马彦祥被安排到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室”学习。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前，始终未予分配具体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彦祥向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1979年5月5日重新作出——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父亲为什么如此简单扼要地概述自己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从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父亲是文化部系统最后得到政治平反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案子”和田汉的冤案紧紧拴在了一起，大有田汉不昭雪，马彦祥不解放之势。1979年4月25日党中央为田汉举行了追悼会，并公开为田汉平反昭雪，隔了10天，于5月5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才宣布“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这当然不是巧合。对父亲来说，历经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险途，最大的伤痛莫过于心死。他永远不想再碰触那些难以痊愈的伤疤，过去的让它永远过去吧。只有对戏曲事业的追求，可以使他那心灵上创伤得以康复。

现在，我只得在他当年的难兄难弟留下的影像中漫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片断，来体会同样身临其境的父亲当时的状况了。

#### ◇ “触及灵魂”的学习班

1966年6—8月间，改组后的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多人的集训班，任务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原文化部各级领导和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及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导演、教授、编辑，这些人物被统称为“黑帮分子”，其中有林默涵、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冯雪峰、田汉、阳翰笙、周巍峙、曹禺、刘白羽、马思聪、叶浅予、萧干、唐瑜、冯亦代、黄苗子等等，他们都是父亲几十年的朋友、战友、同事和领导。自然父亲马彦祥也名列其中。

在开班典礼上，班主任说：“你们想回去，可以呀，只要你‘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下午就可以回去！”还说：“周扬同志本来也是要来的，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得了……”。

开始时，大家还觉得“相当悠闲”。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也不错。两人一室，窗明几净，席梦思床，有服务员拖地板、送开水，像住招待所。只是每个房间住的人，各单位打乱分住，互不相识。

伙食出奇的好，唐瑜的评价是“相当精彩”。

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白天学习、读书、谈心。中午午睡，晚上没事。周六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正面的，一部是“反面”的（被批判的“毒草电影”）。

唐瑜回忆，当时“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他还笑着悄悄对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

舒芜回忆：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伙食，就这样，上面还说，有的老同志，还可以吃得更好些。还在忙着为田汉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组织更高级的伙食。才过两个来星期，陈强在南天河“四清”时瘦陷下去的两腮，重又丰满了起来。

晚饭后，大家到后园散步、聊天。不时可以听到黄苗子、冯亦代的高声谈笑。赵丹、孙维世他们每天说说笑笑。

被贬到四川重庆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也被召回，因匆忙赶来，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了双凉鞋。他问唐瑜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集训班政委拉着唐瑜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唐瑜这时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

好景不长，随着外界“文革”形势的发展，集训班里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很快就贴上了墙壁，过道上琳琅满目。食堂厨师贴出了大字报：“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后来厨师们做好做歹地继续烧饭，食客们则要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也取消了，一起吃大锅饭。

一天，人们听说了一条惊人新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大家议论纷纷。文化部派人来讲关于周扬的“罪行”，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

田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李政委来谈。问我这些时候想些什么。我把心里的苦恼告诉他。我对自己的看法还难提到中央对我的看法的高度，我怎么能是“反共老手”呢？

李政委告诉田汉说：“检查要从大处着眼，从文艺思想着眼，十七年来哪些文艺思想受了周扬的毒害，又通过自己毒害了人民。”田汉渐渐明白自己的“问题”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

开始是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周扬，没有涉及自己。在揭发周扬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大家争当“左派”。每天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都是冲着别人的。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洁白无瑕；还有人揭发林默涵是抱周扬大腿升官的。

昨日亲密谈笑之声已经远去。人们提高了警惕，害怕别人牵连自己，或者害怕自己牵连别人。夏衍在楼梯口遇见唐瑜，四顾无人，便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随后，夏衍、田汉、阳翰笙及邵荃麟、袁水拍、胡风、冯雪峰、瞿白音、周作人、丁玲、陈企霞等人也被公开点名，揭发对象越来越多。

人们之间开始揭发、检举，上纲上线。大字报把林默涵的名字画成一只带毛的狗。邵荃麟病重，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被说成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在食堂吃饭，吐了一根实在咬不动的肉骨头，被当场斥骂并喝令他吐的东西重新咽下去。孙维世被扣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

我查遍老人们的回忆，没有访到父亲的影子，不仅令我感到一丝遗憾，而遗憾之余，没有看到父亲在面临非常时期的表现记录，又感到一丝欣慰。唉，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表现得惊恐和张皇失措，完全扭曲了人们的本来面目，扭曲了人们的灵魂，让人的尊严遭到践踏而不复存在，这是何等的不幸，这大概也是父亲不愿意回想和张扬那些不幸历史瞬间的原因之一吧。

#### ◇ 向阳湖畔群英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生产的报告》后，给这位军委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两年之后，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最高指示一下达，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国文化部系统群英们，被集中在湖北省咸宁县向阳湖畔。

当时已属老弱病残者大有人在，文化部系统除去被关进监牢的，余者几乎被“干校”一网打尽。

我又从佟韦在《向阳湖里向阳人》的回忆中，寻找历史的故事和父亲的踪迹：

1969年9月，文化部大批同志浩浩荡荡，来到闻名的“火炉城”——湖北咸宁，进入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在向阳湖。我们文化部以政治部为主和临时编入的共七八十人，被编为四连，驻地为胡黄二姓最多的小村——胡黄张。周巍峙、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四位同志是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编入的。周巍峙同志和我被分配同住一室。

周巍峙同志到干校来，如果只论劳动锻炼，他是颇为乐意的。他很早参加革命，经历过劳苦，饱尝过艰辛。但他此时不同，夫妻儿子离散数处，又戴着“法国特务”的嫌疑的帽子下来，一位革命者受此待遇，岂能心甘情愿？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同志，能从宏观上估量形势，暂且忍辱负重。因此，他接受着最难、最孤单、最苦、最累的劳动：背煤担菜、扎搭工棚、和泥砌砖、盘修炉灶、拉车驾辕、种菜浇粪、放鸭喂猪、湖里赶牛护麦、黑夜看机器浇水等等，多种多样，没早没晚。他劳动最多的是放鸭子，“鸭司令”因而得名。而他的手则是目不忍睹的，掌中的老茧横生，撕裂的伤口一道道，血水流淌在裹着胶布的缝间，他是以心与血在从事着劳动

啊！

一天晚上，连里几个人进到我们屋来，大喊道：“周巍峙，站起来！”随后厉声说：“现在告诉你，你儿子七月就要判重刑了，你有何话说？”周缓缓地说：“运动开始我就被审查，长期不在家里住，孩子们在外说什么，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头头们互相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你听了这消息，竟无动于衷？”那夜又黑又冷，我和衣而卧，伴随着彻夜失眠的人。后来才知道，在我们隔壁（我们的里门相通）住的魏泽南、胡凡夫、王任道、王芸等同志也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他们心里，周巍峙不仅是文化部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艺术家、大好人。连里几个人折腾得大家心神不安，更不用说周巍峙了……又是一天傍晚，全连集合开会批斗马彦祥，周巍峙等三人陪着挨斗。连里头头们怒指桌上摆放的包包说：“马彦祥，你不老实改造，不肯低头认罪，还敢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真是罪该万死！”原来马彦祥托老乡买了包点心，留待夜里充饥，不想被他们大做了文章。本来连里没有责任批斗这四人，但他们变着法儿也要给你一些厉害看。

1971年秋，传达了林彪命丧温都尔汗事件，人心大快。中央文件虽然不向周巍峙同志传达，但他敏锐地明白一切，他对人说：“我在一位同志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看到已将林彪的名字画上两个××，便知道他已完蛋了。”那时许多人喜欢唱京剧，宿舍里、地头上常常有人唱起《红灯记》里李玉和“迈步出监”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要报仇，要申冤”唱段，有时还能发展到群起而歌；周巍峙同志则善于刻制竹木笔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诗句，经过他的刻刀，竟使笔筒生辉（周巍峙同志有着过硬的书法功力）。词句动听，刻制精美，人们无不发自内心地赞美，因为谁都明白这里的内涵是什么。忽然有一天，听说连里要在这些现象里“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消息传来，当年的北影演员管束同志操起二胡，端出茶杯，端坐在“四五二高地”之上，拉一阵唱一阵，中间穿插一段段道白，特别精彩：“各位听真，毛主席诗词，革命样板戏，谁反对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我们就打倒谁！”他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晚上，有人为他担心，有人为之高兴，有人脸色都变了，赶紧去密室策划。第二天，动人的消息传开了：连里决定不抓了，抓不好，反被抓……住在“四五二高地”上，胡凡夫、魏泽南、刘杲、吕济民、李庆元、王玉贵、孙庆仁等同志，面对这一切格外开心，每每谈及都禁不住捧腹大笑。

从向阳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采访周巍峙叔叔的文章中，看到父亲在干校养猪：

周老语气沉重起来，继续叙说道，干校里他所在的四连，属文化部政治部，周老和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都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管得很严。周巍峙和王昆都是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特别是王昆，在“文革”初期，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所以，王昆在“文革”中吃的苦头就更大了。其他三位都是30年代的老人，对江青那时的表现很清楚，当然也被整得很凶的。在干校，其他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却不行。有几个月出外看病，都要有人“跟着”。司徒种菜，马彦祥养猪，周老和唐瑜放鸭子。看管他们的虽然本身不是坏人，但受大气候的高压，对待他们这四个人（他们自嘲是“新四条汉子”）相当糟糕，几乎所有的苦活都要他们干，扎工棚、踹泥砌砖、修炉灶、拉车，等等。

1972年9月，此时距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已经一年，国内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我带着不到四岁的女儿淑文到咸宁干校看望父亲。当我背着孩子走出咸宁县城后，展现眼前的是一片红土地，原来我只见过东北的黑土地，听说过陕北的黄土地，从未听说还有红土地，我好像走进了另一片天地。现在我已经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摸到文化部干校的了，我看到父亲所在连部是坐落在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丘陵上的红砖排子房，食堂建在坡下，旁边还有饲养着“巴克夏”英国纯种的猪圈，不禁纳闷，心想：“这儿的生存环境比我所在的京郊农村强多了。”我向一位

30多岁的女干部打听父亲的下落，她的回答更是令我吃惊，“马局长在‘湖’里，过一会就会来打饭。”怎么到了这步田地，父亲还能享受如此尊称？它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难道是天快亮了？

我稍等了一会儿，就见父亲挑着一副木桶，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白毛巾，从远处姗姗走来。瞬间，我感到鼻子一阵发酸，心想：“老爸啥时受过这个罪呀。”父亲对我的突然出现也颇感诧异，而孙女的一声“爷爷”的呼叫，缓解了我与父亲之间的尴尬。父亲指着等在一旁的那位女干部说：“这是张阿姨。”一句话说得她十分不好意思，她是萝卜长在贝上，贪上大贝（辈）儿子了，我只好叫阿姨了。张阿姨把我安排在回京探亲的司徒慧敏的床铺住下。

父亲是一个人住在“湖”里，看守工棚，向阳湖里的荷花已经开败，父亲赤足下湖采下几支莲蓬，还从水井里捞上一支失足的青蛙，一并作为见面礼，送给孙女淑文，这是爷爷留给孙女的第一印象，这朦胧中的记忆却永远铭刻在了她的心中。有些当时父亲对我讲述的话，随着岁月流逝，我都已经淡忘，而当时不足四岁的淑文却至今记忆犹新，“爷爷说，他刚到干校时，插秧，两脚因长期泡在泥里，脚趾甲都脱落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诉苦，他倒告诉我干校有小卖部，馋了可以买到罐头吃。我是近年才看到一些有关咸宁干校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了父亲因为买点心吃，受到了军宣队组织的批判、斗争，那包点心也被示众，还害得周巍峙叔叔等跟着陪斗。当时父亲和周叔叔被打成“小四条汉子”，在“专案审查”之例。到我去的时候，由于林彪事件出来，“军宣队”已经撤离，一部分干部获得平反，政治氛围宽松了许多。难怪原文化部总务处处长夏义奎叔叔见了我，还戏言：“思猛，你爸爸可是个公子哥儿出身，很不容易啊。”还是他告诉我，父亲在干校吃了许多苦。但是我看到父亲、夏叔叔和我们家的老邻居原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朱明叔叔等，都表现得非常乐观，好像看到黎明在即，曙光就在前面。

我在干校住了一周多，祖孙三人一起过了中秋节，这也许将是我们三代人都无法忘却的相聚在异乡的梦。

“文革”后，父亲在自己的晚年倾其余力为抢救戏曲资料，恢复戏曲健康发展奔走大江南北，他没有时间再去计较那些不堪回首的冤怨，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之光献给了戏曲的未来和希望。

□ 摘自《攒起历史的碎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